



三足鸟文丛



人与鬼神之间

宋兆麟 = 著

学苑出版社

巫覡



（此处文字模糊，疑似“书名”）

正观

（此处文字模糊，疑似“作者”）

（此处文字模糊，疑似“译者”）

（此处文字模糊，疑似“出版社”）



三足乌文丛 刘锡诚主编

巫 覡

——人与鬼神之间

宋兆麟 著

学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巫觋——人与鬼神之间/宋兆麟著.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1. 12

(三足乌文丛/刘锡诚主编)

ISBN 7 - 5077 - 1102 - 1

I. 巫… II. 宋… III. 巫术 - 研究 - 世界 IV. B9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71652 号

学苑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万寿路西街 11 号 100036

北京市王史山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 × 1168 32 开 14 印张

2001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3000 册 定价: 28.5 元

整合

——《三足乌文丛》总序

刘锡诚

不同世界观的文化史家和思想史家中，都曾有人表达过这样一种非常接近的思想：世界上任何一个现代民族中，都存在着两种文化。如果采用一种简化的公式来表达，我想，可以概括为：一种是上层文化，一种是下层文化。这两种文化是同源而异流的，即源于本土的原始文化，在人类社会出现了分工，出现了被称为“劳心者”的思想家后，便逐渐创建了上层文化，而处于社会底层的广大社会成员——民众，则以传承的方式承袭着和发展着本土的原始文化；这两种文化，都形成了各自的传统，对我们现代人来说，两者都是传统文化，但它们之间，既有区别，又相渗透。

具体说到中国的传统文化，大体也是如此，一种是上层文化，一种是下层文化。虽然经历过春秋战国和魏晋南北朝两次大的文化转型，儒、道、法各派在互相排拒和互相吸收中大大地推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但到了清末，大抵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上层文化，已僵化到了严重脱离广大人民群众、束缚自由思想和扼杀创新意识的地步。1840年以后，在西方文化（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影响下，一批代表维新思潮的思想家，已经开始反思中国文化的局限性，涌起了一个“西学东渐”的浪潮，政治上的改良主义于是也大行其道。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一批革



命的思想家和文化人，背叛了养育过他们的上层文化，从旧营垒里冲杀出来，他们的旗帜上写的是：反对旧礼教，打倒孔家店，提倡民主和科学，提倡白话文。同时，他们当中有的人执著于借鉴西方文化，有的人则热衷于提倡民间文化。民间文化就是下层文化。民间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在我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昭示的，实际上是以民主和科学来整合中国的上层文化与下层（民间）文化，推动中国文化的科学化和现代化。

鲁迅说：民间文化的特点是“刚健清新”。“旧文学衰颓时，因为摄取民间文学或外国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这例子是常见于文学史上的。”（《门外文谈》七）“歌、诗、词、曲，我以为原是民间物，文人取为己有，越做越难懂，弄得变成僵石，他们就又去取一样，又来慢慢的绞死它。譬如楚辞罢，离骚虽有方言，倒不难懂，到了杨雄，就特地‘古奥’，令人莫名其妙，这就离断气不远矣。词曲之始，也都文从字顺，并不艰难，到后来，可就难读了。”（《致姚克信》1934年2月20日）文学如此，文化莫不如此。当一种文化到了快要僵死的时候，摄取民间文化或外国文化而获得一个新的转变，也是符合文化发展的规律的。

在过去的一百年间，“五四”先锋们开启的中国文化整合方向，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和承继。虽经几代人的呼吁和努力，下层文化

也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拯救和认同，但应当坦率地承认，进展并不都是很顺利的，道路也不是笔直的；即使有一些人在做，也往往是孤立无援，得不到社会重视甚至承认。近邻印度人的《摩珂婆罗多》的出版仪式，曾列为当年国会的大事；芬兰人的《卡列瓦拉》的编纂成书，曾被尊为民族独立的象征。在我们，《格萨尔王传》何曾得到过这样的荣耀？恐怕连许多文化史家文学史家也是没有接触过的。近五十年来考古学的发现，改写了中国的上古文化史，使中国文化起源的“多元论”成为不争的结论。但考察中国文化研究界，似乎并没有从考古学的发现中得到多少启发，仍在固守着先祖们的家业。远的说，汉民族及其文化的形成，是融合多民族及其文化的结果；近的说，中国由于多民族的构成，其文化（有的民族也有上层与下层之分），也是多元一体的文化。而下层文化的发展，虽然或多或少地受到上层文化的影响，民族之间也曾不止一次地发生过或强或弱的文化（包括外来文化）交融，不论发生怎样的影响和变化，从总体来说，下层（民间）文化虽然有某些惰性，但它从来是生生不息、富有活力的，而且至今仍然有其较为独立的品格和体系。多少民俗学家和文化人类学的调查，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抛开或忽略下层文化，特别是多民族的下层文化及其交流与融合，忽略中国传统文化的整合，去谈论和研究中国文化史，越来越显示出其研究的片面性和保守性。

对下层（民间）文化搜集和研究的薄弱或缺席，所导致的，不仅是现阶段文化研究的片面性和保守性，与“五四”时代比较起来，在指导思想上甚至还呈现了某种倒退的趋势。这无疑是应引起重视的。

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中华文化是惟一没有断流的文化。而一个悠远稳定而不断创新的文化传统，则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



的凝聚力和不断前进的内驱力。“五四”运动举起的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在 21 世纪，仍然是我们传统文化整合与研究的圭臬。

我们编辑这套丛书的目的，正在于促进对搜集和研究下层（民间）文化上，给予更多的注意。流布于民间的下层文化，对于我们当世的知识界来说，所知者甚少，而未知者则甚众。而要以民主与科学为指针整合中华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文献资料和书斋研究固然重要，但相比之下，首当其冲的还是要深入到民间去，深入到下层民众中去，去采集，去观察，去调查，去研究。这就急需吸取新兴的人文学科如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的田野调查和参与观察的方法。1994 年笔者为学苑出版社出版的《中华民俗文丛》20 种所写的序言中所提出的“实证”的方法，仍然没有失去其价值。我们欢迎更多的朋友，义无反顾地加入到这项事业中来。为此，才有了这套《三足鸟文丛》的编辑与出世。

参加文丛的作者，因其文化背景不同，切入的角度和掌握的资料也不尽一样，每本著作的风格肯定是各不相类的，但我们所希望的是：

一、尽可能遵循实证的原则，从丰富的材料（特别是田野资料）中推衍出应有的结论，切忌流于当前风靡著作界的空论玄学；

二、行文要明白畅顺、深入浅出，尽量避

免诘屈聱牙、食古不化、食洋不化、故做艰深的文风，以便能没有障碍地与读者交流。

三、配有一定数量的照片或图画。对于某些学科来说，文字的叙述有时不能代替图画的展示，前人或实景的图画（最佳是老照片），能起到文字无法起到的实证效果。

下面的这段话就是《三足乌文丛》的“出版献辞”：

“三足乌”是中国神话中的太阳鸟。化身于光明，象征着生命。

王充《论衡·说日》曰：“日中有三足乌。”《淮南子》曰：“尧时十日并出，草木焦枯，尧命羿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九乌皆死，坠其羽翼。”留下的一乌系三足，传为日精，或驾日车者，为中国先民所崇拜。

民间文化源远流长，代代相承，如“日精”之生生不息，“日车”之滚滚向前。民间文化与上层文化，共同构成中华文化的博大与精深。

本“文丛”名为“三足乌文丛”，正是取意于此。愿三足乌驾太阳之车，永向光明。

2001年2月10日于北京

前 言

说起巫觋、萨满，现代人很自然地把他们与装神弄鬼联系在一起，对他们的真实地位已经不知详了。其实，他们也有过辉煌，只是被淹没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了。事实上，它也有产生、发展、没落的历史过程，而且它与人类的早期文明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为了正确地认识人类的童年，研究人类的文明起源，就有必要认真地讨论“巫觋”的问题，给它以历史的正确评论。

巫是一种古老的宗教，因以巫觋为核心展开宗教活动而得名。最早的宗教主持人是氏族长、部落首领，后来才有巫师。我国古代称“巫觋”，女性为“巫”，男性为“觋”。《说文》：“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象人袞，舞形，与工同意。”所谓“事无形”，即指看不见的鬼神，但请神必须歌舞，可见巫是人与鬼神的媒介，是巫教的执行者，又是通晓歌舞的人。这里所叙述的巫，有两层含义：一种是广义的巫，包括巫师、信仰以及有关活动，按照约定俗成的说法，可称为巫教，包括萨满教在内；另一种是狭义的巫，指男女巫师。

在正式叙述巫教之前，有三个问题应该说明一下：

首先，巫教有一个发展过程。

宗教史分为自然宗教和人为宗教两大阶段，前者指无阶级社会的宗教，后者指阶级社会的宗教。由于巫教是古老而跨时代的宗教，其社会性质则要具体分析。如同其他事物一样，巫教也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其中可分为若干历史阶段：原生巫教、次生巫教和再生巫教，它们分别流行于史前时期、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并残存到近现代。这三种巫教，不仅反映了巫教的发展过



程，也说明它们有不同的社会性质。原生形态的巫教性质古朴，信念简单。其次形态的巫教已开始向一神教过渡，其中的祭司有较高的社会地位，甚至左右王权。《左传·成公十三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戎是征战，利用战争掠夺奴隶和财产，是维护奴隶制的重要保证。祀是巫教活动，通过祭祀祖先等活动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奴隶社会的巫师已有阶级的分野：一部分成为奴隶主阶级的御用巫师；一部分仍然是人民群众的巫师，两者的性质是不同的，巫师阶层既有自然宗教的成分，也有人为了宗教的性质。当时的巫师在发明文字、天文历算、医药卫生和文学艺术方面有许多杰出的贡献。有些巫师在政治上也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有的则建立过不少丰功伟绩。因而当时是巫教的辉煌时代。但是进入封建社会以后，巫教已经变成没落的、腐朽的人为宗教，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科学文化上都走向了反面，巫师则变成了欺骗人民群众的寄生虫。由此可看出，对巫教应该历史地、辩证地进行分析，区别其发生、发展和没落等几个历史阶段。只有区别上述不同的历史层次，才能看到不同时期的巫教有不同的性质、特点和作用。

其次，巫教内部可分为不同类型。

我国的巫教中，可以分为两大类型：一是北方的巫，即萨满，这种巫以神灵附体为特点，分布于亚洲、欧洲、北美洲和南美洲，尚

处于原始信仰阶段，没有发展到祭司阶段，当然没有文字等；一种是南方的巫，它不仅有类似萨满式的原始巫，如壮族的女巫、彝族的苏尼、藏族的普米，这些巫也以神灵附体为特征，没有较多的文化知识，处于原始信仰阶段，但是同时已出现了祭司，这是一种比较高级的巫，他们已经放弃了神灵附体的通神方式，而是通过占卜、主祭等形式代表神灵发布意旨，这些祭司已经半脱产，有一定的经济收入，有条件从事一些文化知识的积累、总结，而祭司活动本身也需要许多文化知识，因此使他们掌握了较多的历史、文学、音乐、舞蹈、医药、天文历法和传统文化知识，使他们成为知识分子的雏形，有些祭司还发明了文字。由此看出，巫觋应该分为两大类型：巫与祭司，或者称神灵附体巫与代神言巫、小巫与大巫。

祭司是巫教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发端于原始社会晚期，是与父权制的确立分不开的，并且是文明起源的催生婆。

第三，巫教与后起的人为宗教不同。

两者主要有以下几点区别：

1. 巫教是各民族自发的信仰，没有创教人，与氏族部落的隔绝状态相适应，巫教也没有宗教组织，只有血缘纽带起一定的作用；人为宗教则有创教人，有一套严密的宗教组织。

2. 巫教的巫师是人神之间的媒介，是不脱产的兼职宗教人员，他们没有特权，也不是支配信仰的权威；人为宗教则有脱产的专职人员，他们的创教人就是支配信仰的权威，如道教的老子李耳，佛教的释迦牟尼，基督教的耶稣，伊斯兰教的穆罕默德。

3. 两种宗教信仰的对象有很大区别，巫教信仰多神，以自然神和祖先为主，诸神互不统辖，彼此平等，没有至高无上的神灵；人为宗教则信仰一神教，有至高无上的崇拜对象，如佛教的佛，基督教的上帝，伊斯兰教的真主，道教的张天师。



4. 巫教没有教派之分，但有强烈的血缘性、狭隘性和地方性；人为宗教则突破了血缘和地方的界限，变成庞大的信仰集团，内部也出现了不同的教派。

5. 巫教缺乏完整系统的思想体系，没有自己的经典，其宗教信条、禁忌与生活习俗交织在一起；人为宗教则有自己的完整体系，用文字写成经典，有严格的教规。

6. 巫教没有固定的活动场所，基本上是在氏族或村落内活动；人为宗教则有自己的庙宇、教堂或礼拜寺。

巫教虽然没有遍布于世界的宗教组织，但是它却是中外各民族普遍的信仰，以中国而论，古代各民族无处不有巫，无人不信巫。如汉族的巫覡，藏族的本教，彝族的毕摩教，纳西族的东巴教，普米族的沙巴教，满族的萨满教等，均属巫教的范畴。

过去我们对巫教的研究工作比较薄弱，巫教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被视为研究的禁区，谁要有所涉足，不是冠之“猎奇”，就是被扣上“资产阶级民族学”的帽子。但是，过去也有不少同志对此作了大量的工作，民族学界的同志在调查中收集了不少第一手的巫教资料。三中全会以后，上述禁区被打开了，调查巫教之风空前活跃，发表了不少有水平的学术论文，并且出版了有关专著。

作者对巫教问题有浓厚的兴趣。记得童年

时代在东北农村就目睹过不少巫婆、萨满的表演，后来在业务实践中又经常遇到巫教的问题。我是学考古的，后来专门从事史前史的研究，但是工作实践也暴露了单一学科的局限性，如工具的复原、社会组织和婚姻形式的再现等等，仅凭考古资料是无能为力的。应该承认，考古资料是很重要的，它能给我们提供一个确定无疑的历史坐标，能勾画出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轮廓，但是历史是具体的、生动的，既有骨骼，也有血肉，所以必须求助于其他学科的帮助，特别是民族学的借鉴，才能使“死化石”与“活化石”结合起来，从而有助于史前社会的复原。幸而我在 50 年代即跟林耀华老师攻读民族学，并参加过桂北地区的民族田野调查，在此基础上又花了较多时间先后在全国的范围内进行了民族学调查，并且把考古学与民族学对比起来加以研究。经过多年的努力，在民族考古、物质文化等研究上取得了一定成果，写了一批论著。事后又开始从事远古文化史的研究，其间又遇到了一个新问题：一方面体会到运用民族学资料去印证某些可见的考古学上的物质文化还是行之有效的，也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对于意识形态方面的研究就没有那么容易了，何况过去史前宗教、原始思维都在禁区之内，30 年来民族学界缺乏这方面的系统研究。因而，要想真正了解史前文化艺术的奥秘，或者理解后进民族的风俗习惯，不仅要运用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方法，更重要的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尤其要了解他们认识、观察和解释问题的方法。基于上述考虑，作者带着远古文化史研究的有关问题，把研究的重点转向意识形态方面，从直观的民族学资料入手，再结合历史文献记载，对巫教作了一些新的讨论和研究。本书就是上述研究的一个结果。

由于笔者水平不高，占有史料有限，研究不够深入，还不能全面、系统地阐明我国巫教的所有问题，更不是讲中国巫教历



史。作者所能做到的，一是为读者提供一些比较丰富的巫教史料，二是对巫教问题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如巫教的性质、历史层次、巫覡类型，以及祭司对科学文化的影响等等，以期引起学者们的讨论。可以预言，像巫教这样刚刚从禁区中解脱出来的研究课题，绝不是一人或一代人就能解决的，它与其他重大的科学课题一样，必须经过几代人或几个世纪的共同努力，才能描述明白，而每代人只能做当代所可能做的工作，如同接力赛跑一样，每个人都要跑好自己所承担的一棒，最后奔向比赛的终点，但是科学是没有终点的。

作 者

2001 年 8 月

目 录

整合——《三足乌文丛》总序	刘锡诚
---------------------	-----

前 言

第一章 巫之兴衰	(1)
----------------	-------

(一) 初兴	(1)
--------------	-------

(二) 黄金时代	(10)
----------------	--------

(三) 衰落	(19)
--------------	--------

第二章 鬼神世界	(36)
----------------	--------

(一) 灵魂	(36)
--------------	--------

(二) 自然神	(44)
---------------	--------

(三) 图腾与族徽	(55)
-----------------	--------

(四) 生殖神	(64)
---------------	--------

(五) 祖先神	(70)
---------------	--------

(六) 人造物神	(81)
----------------	--------

(七) 社会神	(89)
---------------	--------

第三章 通神之巫	(98)
----------------	--------

(一) 女巫的出现	(98)
-----------------	--------

(二) 神的代言人	(105)
-----------------	---------

(三) 传授方式	(112)
----------------	---------

(四) 巫师的种类	(118)
-----------------	---------

(五) 巫衣与法器	(135)
-----------------	---------

(六) 巫师的骗术	(147)
-----------------	---------

第四章 巫覡仪式	(158)
----------------	---------

(一) 释兆	(158)
--------------	---------



(二) 占卜	(168)
(三) 祭祀	(183)
(四) 巫术	(214)
第五章 巫与文化艺术	(233)
(一) 巫师文字	(233)
(二) 祭辞文学	(241)
(三) 巫述历史	(250)
(四) 巫舞	(259)
(五) 巫画	(270)
(六) 巫塑	(282)
第六章 巫与科学知识	(290)
(一) 占卜与数学	(290)
(二) 天文学	(298)
(三) 星占术	(302)
(四) 医药知识	(309)
第七章 神明裁判	(329)
(一) 神判实例	(330)
(二) 法与神判	(340)
(三) 神判的历史意义	(347)
第八章 祭司与文明的起源	(357)
(一) 史前社会晚期的剧变	(357)
(二) 颛顼的宗教改革	(368)
(三) 文明起源的催生婆	(376)
结 语	(382)
(一) 巫觋的历史作用	(382)
(二) 巫觋的长期延续和 我们的对策	(388)